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对比语言学：

历史与哲学思考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urvey

潘文国 谭慧敏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对比语言学：
历史与哲学思考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urvey

潘文国 谭慧敏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 潘文国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6

ISBN 7-5444-0475-7

I. 对... II. 潘... III. 对比语言学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6619号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潘文国 谭慧敏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插页 3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250 本

ISBN 7-5444-0475-7/H · 0027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兼对比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现担任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四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出版过《汉英语对比纲要》、《韵图考》、《字本位与汉语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研究》等专、译著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七十多篇。



谭慧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有近二十年的翻译经验，担任南大翻译课程统筹。研究与教学范围包括现代汉语、近代汉语、社会语言学、计算汉语、对外汉语等，并指导汉语语言学与翻译学博士生。编著《翻译与语言对比研究》、《汉语走向世界》、《语言的多视角考察》，发表论文数十篇。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前 145—前 87?)

历史的方法将来仍须伴之以
哲学的方法，对纯粹思维的任何忽
视，定会损害人们的科学研究。

——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

对比语言学的新发展(序)

杨自俭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

读了潘文国、谭慧敏的这本新作使我想起了1996年4月我为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写序的时候,现已近10年了。当时我正在筹备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二次全国大会,想请徐通锵先生来会上讲讲汉语“字本位”问题,他因忙于修改《历史语言学》,没能成行。但文国为大会提交的两篇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论文起到了补救作用,一篇讲对比语言学理论与学科体系问题,另一篇是《换一种眼光如何?——关于汉英对比研究的宏观思考》。就是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英汉对比研究和汉语研究都严重地依赖英语,以英律中,明确提出要摆脱“印欧语的眼光”,他说从地道的汉语出发,就是“语言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改观”。同时转述了徐通锵先生关于“字本位”和英语句子封闭性与汉语句子的开放性的思想,并指出只有从汉语出发才能使对比研究“达到真正的深度和广度”。后来我们学会讨论学科史和“两张皮”的问题,文国都带头做出了成绩。他在2000年第1期《语言研究》上刊载了长达27页的《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2001年4月在青岛翻译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上发表了史论结合的关于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中国翻译》2002年1~3期连载3期),同年10月在大连教授沙龙讲了“两张皮”的由来及对策,2002年第1期《世界汉语教学》刊登了他的又一篇长文(26页)《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同

年他还出版了专著《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发表了他的《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近期他在访问新加坡，与南洋理工大学谭慧敏博士合作完成这本著作的同时，还在和徐通锵先生共同主编“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暂定8本，详见徐通锵先生写的总序，载于《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并亲自撰写其中的《字本位和普通语言学》一书。我之所以罗列文国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想探讨：（1）这十几年他在对比语言学这个领域所思考的问题、所做的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他这本新作产生的基础和条件。（2）在此基础上总结一下他治学的道路和学科建设的经验。文国他们的这本新作的确做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不论是中国的和西方的学科理论史的研究，还是对比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可以说，这本新作的出版标志着国内外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和学科理论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主要基于我读后有几个感受很深的问题，现简述如下。

1. 立意高远。

我之所以说此书立意高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据。

（1）它把对比语言学看成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它挖掘和继承了西方洪堡特（W. von. Humboldt）、沃尔夫（B. L. Whorf）、叶斯柏森（O. Jespersen）和中国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林语堂等人关于对比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关系的思想，比如洪堡特说：“从哲学观念上看，人们还几乎只是停留在普遍语法的贫乏境地。甚至对普遍语法，也极少视之为是一门纯理性的科学，更未把它看作一种普遍的比较语法。”赵元任说：“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文国评论赵元任这句话说：“据我们所知，在洪堡特之后，中外语言学家中还没有一个人把语言对比提到这么高的地位的。这句话也成了1990年以后中国对比研究的主旋律，许多有成就的学者、

有影响的著作都是本着这个精神来进行对比研究的。”其实文国他们这本书各部分都贯穿着这个精神：对比语言学的理论目标就是做普通语言学的支柱。

(2) 中国汉外对比研究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学。马建忠、章炳麟、王国维、赵元任、李方桂、陈望道、罗常培、黎锦熙、王力、吕叔湘、高名凯、朱德熙、张志公等为代表的前辈语言学家，大都学了外语来研究汉语，为的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汉语语言学，这是他们终生奋斗的目标。在古代世界上有三大语言研究中心，中国的训诂，希腊的语法，印度的音韵，各有特长。中国从先秦到 1898 年《马氏文通》出版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传统，即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小学传统。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称小学为“文字之学”，这说明中国古代语言学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字形（文字学）、字义（训诂学）、字音（音韵学），而不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所以不研究语法。西方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不重视研究文字，很重视研究语法。和西方语言学研究传统相比这两点就是我们语言研究传统的最突出的特点。《马氏文通》改变了这个传统。印欧语言学的理论引进来以后，特别在语法理论中引进了汉语中找不到恰当对应物的两个重要范畴词（word）和句子（sentence），还有其他一些语法范畴比如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时（tense）、体（aspect）、态（voice）、人称（person）、语气（mood）以及名（noun）、动（verb）、形（adjective）、代（pronoun）、副（adverb）、连（conjunction）、介（preposition）和主（subject）、谓（predicate）、宾（object）、表（predicative）、定（attributive）、状（adverbial）等等以后，我们的语言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语法学成了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学科。所以《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时期开端的标志。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但大家都感到中与外的关系和古与今的关系都处理得不够好。文国分析说，中国古人的语言研究走的是另

一条路,19世纪末我们急于学西方走富国强兵现代化之路,中国语言学家心怀民族振兴的重任,孜孜追求建立西方式的汉语语法体系,“这恐怕是他国的对比语言学家们所想象不到的。西方对比语言学的鼻祖们,即使是洪堡特、叶斯柏森和沃尔夫,大约也没有想到过对比语言学可以成为一个民族语言学建立的基础”。我们的语言研究在处理中与外、古与今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什么问题呢?潘文国把这个问题放在普通语言学的观照下,先引证评述了洪堡特、高本汉、叶斯柏森等对汉语特点的论述,后又引证评述了陈承泽、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何容、高名凯、张志公、徐通锵等人的思想观念与困惑,得出结论说汉语和印欧语是两大不同类型的语言,其本质差别在于语义和语法形式的关系不同,也就是有没有“形态”,汉语没有印欧语词类和句法那样对应的关系。张志公说:“印欧语都是形态语……汉语本身是‘非形态语言’。形态语和非形态语是明显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我们应当理直气壮、明白无误地确认汉语‘非形态’这一事实,从而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法框架,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1990年)潘文国说:“否定‘形态说’和否定‘词’的概念是语言对比研究带有全局性的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普通语言学理论是个相当大的冲击。”他分析了研究汉语的9类学者之后说:“我们有必要研究中国的汉外对比发展史,从中来观察汉语研究和中国普通语言学研究的真正进展。”汉语的研究必须走中外和古今两个结合的道路,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证明,中断自己的传统、跟着外国的理论转是没有出路的。

(3) 正确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决定逻辑,逻辑反映和修正历史,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

正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122页)这是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科学而有效的方法,因为它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理论范畴的建立与转化必须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原则;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逻辑上要用范畴内涵的自身矛盾来表达的原则;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内在联系要体现在比较完整而成熟的范畴体系中的原则。我读完文国的书稿深深感到他努力按照这三条原则在思考和研究学科的发展规律、理论系统、研究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

(4) 用高层理念来观照学科全局。人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对人类的命运有着强烈的终极关怀,它关心过去与现在,但更关心未来。当然在这一点上哲学是排头兵。但吕叔湘(1988)说:“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人文科学。”所以它也有这种品质。不过以前很少有人关注语言学的高层理念问题。文国在这本书中多次讲到中国语言学问题要让外国学者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外国语言学家应主动关注中国的语言学,因为语言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存异求同,他重申了《论语》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说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友好而和谐地共生,不然“就意味着语言世界的纷争和人类社会的不太平”,在书的结尾处他画龙点睛地宣告:“对比语言学的终极目标是求‘和’,这也是本书的最终结论。”由此足可以看出他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境界之高,我读后大有登上泰山极顶一览众山小之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高层理念,实际就是学科的灵魂,它观照和统帅着学科的全局与各个层面,所以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都不应把“灵魂”的位置放错。

2. 理论研究更加深入系统。

此书在研究了中西对比语言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抓住三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在学科基础论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语言定义。他在

波兰对比语言学家菲齐亚克(Jacek Fisiak)“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元元理论”,即“以语言观为核心的语言哲学的思考”。对学科结构系统进行纵向划分,比如语言学分为:语言哲学(实为哲学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实践等四个层次。他又把洪堡特以来中外60多种语言的定义分成四种类型的语言观:自足系统观(索绪尔为代表)、交际工具观(斯大林为代表)、天赋能力观(乔姆斯基为代表)、文化语言观(洪堡特为代表),并论证了这四种语言观和地球进化所经历的三个世界(自然、社会、人类)与人类三大知识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密切关系。他还归纳出《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研究“借鉴的三个层次”:具体语言规律、普通语言学、语言哲学。就这样他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语言的定义,用比较与辨析的方法把定义中四个关键范畴(认知、表述、方式、过程)作了多层面的界说,转述了叶斯柏森对索绪尔的批评,明确指出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语言“是包含‘言语’和‘语言’在一起的语言、人们实实在在使用的语言”。读了此书的这一部分使我想到:任何学科都应该建立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中心的范畴体系。范畴的提出、比较、辨析与界定是理论研究的最基础的工程,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构建范畴的逻辑系统(即理论体系)。我国学术界常有人批评范畴研究是“脱离实际,空对空”,“在概念里兜圈子,毫无意义的争论”,这是我国许多学科没有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如果只注重用归纳法进行微观分析,不注重范畴史与各范畴之间关系的研究,那何时才能建立起系统的理论?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最需要的就是自主创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

第二,在学科论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他围绕学科的目标、范围、性质、定位几个重要范畴,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洪堡特、叶斯柏森、沃尔夫、拉多(Robert Lado)、菲齐亚克、克尔采斯佐斯基(Krzyszowski)、切斯特曼(Chesterman)、黎锦熙、王宗炎、赵

世开、许余龙、刘重德等中外学者关于对比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思想 and 系统作了纵与横两个系统的比较,遵照7条原则(刘重德4条,潘文国3条)组建了一个新的学科体系,用三种属性和四个层级交叉结合,组成了8个研究领域(详见书中表格)。这个体系的建构一是扩大了学科研究的领域和层次,二是为其他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学科是否独立最主要的标志是看有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主要靠范畴系统来体现,人文科学的范畴系统不易做到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严密,但至少应划分出几个不重叠不交叉的等级与层次,而且不应该缺少学科的哲学论、方法论和理论史三部分。我们的学术传统中虽然有义理的研究,但由于“没有创造出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完整体系,也没有创造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严密体系”(张岱年),所以我们学术传统的价值系统中缺少理论体系研究的评价标准。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第三,在学科本质论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对比语言学定义。他先研究了和对比语言学关系最密切的两对范畴“比较”与“对比”以及“同”与“异”,既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的过程,又分析了它们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从而得出结论:“对比”和“异”皆有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异同不可分离,异为世界的本质,求同求异皆从求异开始,强调异或同体现理论研究的不同终极目标。这是新定义的第一个基础。第二个基础是研究了洪堡特、拉多、菲齐亚克、詹姆斯(Carl James)、许余龙、王宗炎、杨自俭等人关于对比语言学定义的研究成果。在这两类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定义。新的定义修正和增加了不少内容:哲学基础、和普通语言学的关系、异同的侧重性、理论与应用的不同层面、方言、语言与精神活动的关系、促进交流理解与和谐。他在分析定义中特别强调了洪堡特、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沃尔夫的崇高境界和远见卓识,求异不是相互争斗,制约发展,而是两者互补,共同进步,

让人类的语言生活和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和谐美好。

下定义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但这是我们的短处,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用比喻说明概念的多,下定义的少,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不少进步。我在《语言和语言学》(2002)一文中讲过形式逻辑定义的公式与规则以及辩证逻辑对定义的要求,但还有两个与定义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需要讨论。第一是形式逻辑概念和辩证逻辑概念的差别。前者是从思维形式结构研究概念,它是思维的基本单位,反映事物抽象的同一性,不包含差异和矛盾,概念稳定,不关注其发展变化,关注个体概念,为人类思维发展初级阶段的抽象概念;后者是结合认识的具体内容研究概念,它是认识的总结,反映事物具体的同一性,包含差异和矛盾,概念流动,关注其发展变化,关注概念系统,为人类思维发展高级阶段的具体概念。第二是具体₁——抽象——具体₂的认识过程与方法。具体₁是指人在社会实践中从客观事物的丰富材料中获得生动具体的知觉表象,即低级的感性的具体认识。这是认识的最初出发点。在此基础上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区分具体₁认识中的偶然现象与必然本质,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表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时认识就从具体₁进入了抽象。它虽比具体₁更深刻了,但还不能达到全面具体的认识。然后以这种本质抽象为出发点,用综合的方法,把事物各方面的本质认识联系起来,进而获得事物内在的各种本质属性的统一全面具体的认识,到达具体₂认识阶段。认识始于具体₁,通过抽象完成形式逻辑的任务,最后到达理性中具体对象的具体真理。从具体₁到抽象的方法是形式逻辑的形式论证,从抽象到具体₂的方法是辩证逻辑的辩证否定论证,前者是后者的辅助手段,只有通过后者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的必然规律,到达逻辑终点具体₂,这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周期。客体运动无限,人的认识运动无限,所以辩证思维运动也无限。一个逻辑终点对范围更广与层次更高的认识来说,它又是一个逻辑的起点,认识深

化,概念发展,过程无穷无尽。运用这个辩证逻辑的方法有利于建立学科的范畴系统,因为它的结果是经过一步步辩证推演和转化产生一系列逻辑范畴,进而形成比较完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的范畴系统。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开始,经过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等,一直推演到“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最后推演到“阶级”的范畴。如果把“人”定义为“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有语言和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反映的是区分人和动物的外在共性,这是人的“抽象概念”,属于形式逻辑概念。若把“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反映的是人的内在本质——社会性,这是人的“具体₂概念”,属于辩证逻辑概念。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形式逻辑,更需要辩证逻辑,你读完潘著,回头再思考学术研究和逻辑学的关系问题,我想你一定会跟我有同感:该书一系列概念的比较辨析、推演转化、分类界定都显示了逻辑学的力量,也体现了文国同志的逻辑学水平。

3. 方法和方法论研究的批判继承性与多元性。

本书方法论这一章重点讲了5方面的问题:方法论研究的回顾、研究的原则、研究的出发点、对比的方向性以及求同求异的方法论。文国在这一章告诉了我们如何研究和建设一个学科的方法论问题。我们的学术传统轻视理论,当然也轻视方法论。改革开放以来有了进步,但对于一个学科的方法论进行系统研究的还很少,涉及语言学的,国人写的我只读过桂诗春、宁春岩的《语言学方法论》(1997)、陈保亚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999)、徐通锵的《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2004)。翻译的读过陈小荷等人译的A. Woods、P. Fletcher、A. Hughes合编的《语言研究中的统计方法》。桂著讲的理论方法、描写方法、实验方法主要来自西方,书的重点是介绍这些方法的理论基础、内容和用法。陈著是理论语言学专著,他说:“一种方法论就是一种理论,语言学方

方法论就是语言学理论。”实际此书更像一部“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理论史”，但他研究的路线是揭示语料背后隐藏的方法，追求方法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徐先生的大作是他 20 多年研究成果的结集，他用这 17 篇文章回答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道路问题：坚持走中与西、古与今、方言与标准语三种结合的路线。他强调在中与西的结合上以汉语研究为“结合”的立足点，用对比的方法揭示汉语的特点，总结规律。统计学的方法实际就是数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学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主要是适应语言形式化的要求，以求用机器代替人的一部分复杂的脑力劳动，由于语言是一个元素多、连接方式多、层次多、变化多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所以机器永远只能替代人的一部分复杂的脑力劳动。文国对方法论的研究和上述著作相比有以下特点：

(1) 把方法论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用范畴辨析的方法构建本学科方法论体系。他首先区分了方法和方法论，然后区分宜和不宜看作本学科方法论的方法，然后又区分兼具和不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方法论原则、出发点、方向性等问题。西方语言学 19 世纪以历史为中心，20 世纪以结构实体为中心，21 世纪将转向以关系为中心，比如元素之间、单位之间、内部系统之间、内部大小系统（即整体与部分）之间、内外大小系统之间、复杂巨系统（如社会、人体、大脑、语言之间等）之间等各层次、各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文国的方法论研究在对比语言学领域应该说是这种复杂关系研究的开端。

(2) 只有批判的继承才能创新。我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王宏印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序）中讨论过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主要简析了章炳麟与贺麟主张的“守旧出新”和胡适与汤一介主张的“破旧立新”。当时只说到“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现代的阐释，在找到古今通约性的基础上，通过现代转化使传统的

东西进入现代文化传统”。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研究传统的東西要找到古今通約的内容,使其转化为现代的东西。但首先要搞清楚何謂古今通約性。比如洪堡特方法論思想哪一部分和今天对比語言學方法論有通約性?判斷有無通約性的標準是什麼?然後要探討如何才能找到古今通約性。比如意念與語言的關係問題是沿着歷史發展的順序[從叶斯柏森(1924)——林語堂(1933)——呂叔湘(1942)]去找呢,還是反方向去尋?這是研究如何繼承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僅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傳統中除了有優秀成分之外還有過時了的甚至錯誤的成分,創新常常是從批判這些成分開始的,但這些成分並不是明擺著的,而是和優秀成分雜陳一起的,所以如何找到這些成分就成了既重要又困難的問題。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待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劉元亮等《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第129頁)找到這些成分之後怎麼辦?那就要下批判功夫,湯一介說:“如果不把它不適應現代生活要求的那些東西批判透了,反而無法發現它的真精神在哪裡。”進一步問批判透與不透的標準是什麼?首先要分類,可分出過時的、有片面性的、有局限性的、肤淺的、不系統的、證據不足的、觀點與方法不當或錯誤的等。其次就是通過對這些缺點或錯誤的分析批判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目標、途徑與方法。最後把解決問題的方案付諸實施,變成現實。創新都是針對前人成果的,對其優缺點都需要批判,只是批判的對象、方式方法不同,但目標一樣,一是好中選優,留下培養;一是差壞改好,培植發展,兩者皆為創新,其過程就是批判的繼承,所以無此過程創新都是不可信的。若問在無人研究的新領域創新如何批判繼承?一是要搞清楚是否真的從來無人涉足,這要花很大的工夫,也需要很高的水平,因為時空大資料多;

二是会有与其类似的或者相关的事物,你的研究应该从这里开始,批判继承也从这里开始,而后才能走向创新的道路。本书不论对历史还是对理论的研究都充满了批判的精神和方法,而且在中西、古今、方言与标准语三方打通上做了多项有益的尝试,结论都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批判继承的创新结果,如语言的定义、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和学科体系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3) 方法的多元性。本书首先把方法分成两大类,宜和不宜纳入本学科方法论的方法,然后又把前者分成本体论和方法论相兼的和只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这就把本学科的专用、非专用和常用、非常用几类方法区分开来,理论上有利于体系的建设,应用上便于选择与操作。把“对比和比较”、“求异和求同”、“共时和历时”确定为既有本体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这是文国在理论研究上的创见,它会有力地促进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摆脱对其他语言理论的依赖。另外对背景原则、选择原则、同一原则以及6种“出发点”的论证都是开拓性的研究,在方法论系统中都给它们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总之,本书的方法论研究对本学科方法论系统的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说到一个学科方法论建设的多元性问题,我一直感到应包含哲学的(包括逻辑学的)、系统科学的、相关学科的和本学科的至少四个层次的方法论。因为现代的科学的研究对方法论不但需求种类多而且依赖程度深。当然为一个学科建成这样一个多层次的方法论系统那不是很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4. 为对比语言学理论史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国在这本书中为学科的理论史研究做了三项基础性的工作:一是确立了理论史分期的标准。用国际的眼光,站在普通语言学的高度,围绕学科理论建设和发展审视中西对比语言学及其研究所走过的路程。二是比较有说服力地完成了中西对比语言学分期问题。西方从洪堡特开始至今,划分三个时期;中国从《马氏文